

· 热点透视 ·

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王铁铮

内容提要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整体和系统研究，涉及诸多对其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可归纳为七大问题：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多元文明的流变与古代的北非史；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氏族、部落、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统治；现代化运动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早期的伊斯兰教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潮；北非的政治剧变和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七大问题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专题研究案例，又是一个彼此关联、互为作用、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依据多层面的视阈和大量客观史实，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阿拉伯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独特样貌及嬗变，从根本上影响着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轨迹。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问题构建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一个大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路径，并通过多维度的比较研究来揭示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

关键词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 史学理论 古代北非文明 民族国家认同 殖民主义史 阿拉伯社会主义 伊斯兰思潮 北非政治剧变

作者简介 王铁铮，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异常薄弱的领域。^① 2010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10&ZD115）的研究成果。

^① 非洲阿拉伯国家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东北部，包括10个国家。这些国家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国民的绝大多数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于各种局限，国内世界史学界对阿拉伯国家的研究，通常主要聚焦于西亚和西南亚诸国，以及北非的埃及；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则重点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种状况导致国内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以至于国内至今尚无一部全面反映非洲阿拉伯国家综合性通史的著作，同时也缺乏比较系统的非洲阿拉伯国家国别史研究的专著。

底，以北非突尼斯的“布瓦吉吉事件”为导火线及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发端，引发西亚北非地区多个阿拉伯共和制政权相继垮台，阿拉伯变局举世瞩目。2021年初，恰逢阿拉伯变局走过十年历程。阿拉伯变局折射出的内生性、突发性、连锁性和颠覆性这四大特点出人意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由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累积的各种内外矛盾所酿成，从历史的维度才能对其进行更全面的解读和反思。鉴此，当下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通史研究为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龙头，它不仅是衡量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也在不同侧面代表一个国家史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水平。^① 通史研究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其撰著的难度，而就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来说尤为如此。究其原因：一是国内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的积淀极为有限，尚未形成一种可供借鉴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和研究体系；二是从事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的资源，特别是有关非洲阿拉伯国家古代史研究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阿拉伯人大都不太重视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历史研究，称之为“贾希利亚”^②，即蒙昧时期。这便造成阿拉伯人有关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历史论著的稀缺。而非洲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些小国，诸如吉布提和科摩罗等国，更是被国内学界喻为学术“盲区”，关注和探究者亦属凤毛麟角。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局限。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整体和系统研究涉及诸多问题，一部能够比较客观地把握和勾勒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演进脉络的撰著，需要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审慎的梳理和辨析。

一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理论指导也是强化历史学科学性的前提。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属于综合性研究，涉及面宽广，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教育、妇女问题和生活习俗等诸领域，用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非洲阿拉伯通史研究来说，它首

①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贾希利亚”为阿拉伯语的音译，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诞生前的时期泛称为蒙昧时期。

先面临的是选择或依据何种理论来带动历史研究。1978年之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先后受“西方中心论”和“五种经济形态说”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五种经济形态说”作为苏联史学的主要模式而被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效仿。“苏联史学模式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学术性很强，中国世界史研究就是在引进这种模式的情况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但是‘五种经济形态说’的缺点也很明显，即过分简单化，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过程压缩成僵硬的发展模式，从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①故此，这一时期问世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类似的缺憾。

1978年后，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开始围绕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不断进行开拓性的探索，努力构建世界史研究的新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通过深刻反思，并在吸纳西方新史学流派和“全球历史观”^②有益养分的同时，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三种新史观：即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罗荣渠和钱乘旦教授提出的“现代化史观”；彭树智和马克尧先生提出的“文明史观”。“三大世界史观的提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20多年来的进步和成熟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世界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的交流和融会，以及史学理论和方法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③

三大新史观的建构在理论上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路径和方向具有指南意义。非洲阿拉伯国家多达10个，这些国家的国情独特而复杂，呈现多元的色彩。三大新史观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认知和新构架，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而且开创性地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再界定，从而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三大新史观的创新理论亦可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并以此为杠杆，从不同层面和维度来探讨非洲阿拉伯国家不同时期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以

^① 钱乘旦：《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66页。

^② “全球历史观”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威廉·麦克尼尔等，该派为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时代特征，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主张建立一种“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并从宏观的、联系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走向的方法、观念和理论体系。

^③ 李学勤、王斯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及非洲阿拉伯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怎样由相互闭塞逐步走向开放,由彼此分散逐步走向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 多元文明的流变与古代的北非历史

古代北非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非洲阿拉伯诸国历史的源头。北非曾是多种古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不同文明在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所凝聚的强大能量,不仅推动着北非和东北非的历史演进,并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早实践的地区之一。古代北非的多种文明大致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彰显出各自文明在古代北非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一) 古埃及和古波斯文明对古代北非历史的影响

埃及地处北非历史的十字路口,它把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埃及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沉淀性”的特点,埃及也是多种文明层层累加而成的国家。^①埃及古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借助母权制、传统宗教制度和“神授王权”的意识形态先后建立了31个王朝,延续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独特的传统文化:象形文字、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卡纳克神庙、帝王谷、美农巨像等遗存,以及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天文星象学和医学等,无不浓缩着古埃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因此,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精华。^②古埃及文明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演进的一条鲜明的主线。

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期进入伊朗。^③公元前550年左右,阿契美尼德人在伊朗高原崛起,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波斯帝国,从而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根基。古波斯文明的辉煌,在器物层面上表现为宏伟华丽的新都——波斯波利斯、精美的浮雕和岩雕、连接帝国各地的被称为“御道”的交通网络,以及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基础设施。同时,它还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

^① [美国] 菲利普·C. 内勒著:《北非史》,韩志斌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 [美国]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 雷诺兹著:《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③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著:《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页、第27页。

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成为后来中东地区出现的各个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由于波斯帝国长期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古波斯文明又彰显出鲜明的宗教特点。如同古埃及一样，其对君权神授和正统观点的强调，深刻影响了波斯的发展。波斯曾一度是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大帝国，它吸收了多种文明的先进性，表现出古波斯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而且它超越了原有的文明中心，即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成为主导文明。所谓“波斯帝国的文明秩序”就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古波斯文明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大约 130 多年的时间里^①，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往的局限，实现了亚非两大古文明的互动性交往，推动了古代北非历史空前的跨越式演进。

（二）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对北非历史的再塑造

从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 30 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在近 300 年的时间里，北非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新型的阶段性文明。它使古代北非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都受到了希腊文明的洗礼。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各种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引领西方文明，兴起了第一次“科学革命”。^② 太阳系的理论、解剖学的诞生，以及物理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诸多新成就，如阿基米德定律的创立、圆周率的划分、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的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同时，这个时期的埃及也成为北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案例，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东方文明仍是希腊化文明的根基，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③

^① 自冈比西斯二世起，波斯人先后在古埃及建立了两个王朝，即第 27 王朝（公元前 525 年至公元前 404 年）和第 31 王朝（公元前 343 年至公元前 332 年），两王朝在埃及的统治共计长达 130 余年。

^② [美国] 菲利普·C. 内勒著：前引书，第 24 页。

^③ [美国] 乔治·萨顿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4 页。

迦太基是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第一个文明单元出现在古代北非舞台的又一个重要国家，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它是由来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地区^①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地。后来，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利比亚的地中海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腓尼基人通过不断与操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交往和通婚，创造了一种叫作“布匿”的混合语言文化^②。腓尼基移民建立的迦太基城展示了古代人强大的适应性，而创建一个混合了腓尼基和非洲柏柏尔人要素的“布匿”社会，又说明了民族文化具有变通性。迦太基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和跨越撒哈拉大沙漠的黄金和象牙交易。及至公元前 1000 年的后半期，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强大贸易帝国，是当时的政治和农业中心之一。有研究者评论：“作为城邦国家的迦太基试图像一个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③ 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补充，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④

但是，随着迦太基人在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的败北，^⑤ 迦太基古城终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罗马势力迅速向北非拓展，陆续征服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和柏柏尔部落，统一了北非，先后设阿非利加（即突尼斯）和埃及两个行省，北非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在不同程度上又实现了所谓的“罗马化”。在罗马人对北非长达近 6 个世纪（公元前 146 年至公元 439 年）的统治下，北非的农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发达的农业不断为罗马提供大量给养，成为帝国的粮仓。同时，罗马人还在北非修建了上百座城市，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竞技场、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风格。故此，

① 黎凡特是指现今的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地，另有“肥沃新月带”之称。

② 布匿（Punic），即“古迦太基的”，是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和北非人混居而形成的文化和语言的称谓。

③ B. H Warmington,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eletio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47-48.

④ Stephane Gsell, *Histoire Ancienne de l' Afrique du Nord*, 8 vols 4th ed,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20-1928, p. 389.

⑤ 布匿战争指古罗马和迦太基两个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著名战争，前后共三次：第一次（公元前 264 年至前 241 年）；第二次（公元前 218 年至前 201 年）；第三次（公元前 149 年至前 146 年）。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被灭，古罗马争得地中海西部的霸权。

北非的罗马遗迹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①

（三）早期基督教在北非的扩张和影响

基督教是继犹太教之后在公元1世纪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第二个一神教，具有跨文化的突出特点，反映了希伯来人一神论、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北非、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各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之一。公元二世纪，埃及和其他北非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已出现众多基督教团体，而且基督教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中间传播得最快。二世纪末，非洲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创办的教理学校——迪达斯卡利亚，成为早期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并产生了一大批对基督教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神学家和理论家。

早期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围绕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神或人这个本质问题曾展开激烈争论，参与争论的两个重要派别，即阿利乌主义派^②和基督一性论派都以埃及为据点。由于这两个派别的教义同基督教主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相左，先后被罗马教会和帝国宣布为“异端”和“异教徒”。基督一性论派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上被宣布为异教徒后，经受住了罗马教会和帝国权力旨在取缔和摧毁其信仰所发动的进攻，形成了埃及新的基督一性论的科普特教派。较之其他地区，科普特教派改变了北非和尼罗河流域的基督教发展轨迹，其内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或东正教教派所辖领地的宗教形式。^③

自公元7世纪上半叶起，基督教未能抵御另一新的一神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向北非迅疾扩展，最终确立其主流宗教的地位。作为征服者，初创时期的伊斯兰教“顺应现世”，大量基督徒纷纷改宗。同时，阿拉伯帝国实行伊斯兰教的低税制，与拜占庭对北非属地的强制高税形成明显反差，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吸引力。与此相反，基督教却因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

① [美国] 菲利普·C. 内勒著：前引书，第9页。

② 阿利乌主义派（Arianism）亦称阿里乌斯派，是以生活在公元3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基督教司铎阿利乌命名的基督教派别。阿利乌坚持基督在各方面都与天父的本体和特性不同，基督也与人不同，基督没有人的灵魂，耶稣次于天父，是受造物，圣灵更次于圣子和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产。该派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被确定为“异端”后逐步向罗马以北地区扩张；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e）派，该派认为耶稣的神性超过人性，耶稣并非兼有全神和全人的本性，而是完完全全的神，故而只有一个本性。

③ [美国] 菲利普·C. 内勒著：前引书，第91页。

内斗和分裂不断削弱着自身力量，特别是其教义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北非大多数本地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无法应对伊斯兰教强劲的拓展之势，基督教因而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变化。唯有科普特教派在埃及扎下根，时至今日，科普特教派仍是代表埃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团体和信仰的教派。

多种文明的汇聚、碰撞、融合和更替，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流变波澜壮阔的画卷，并为探究北非的古代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源泉和重要线索。它们不仅能够弥补阿拉伯人因忽略伊斯兰教诞生前古代北非史研究所造成的文献史料方面的缺憾，而且启迪人们从文明交往的视阈来进一步认识和领悟不同文明间交往的内涵、类型、因素、属性、规律和本质，以及文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使不同文明的交往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升华，尤其是如何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等层面来实现文明交往自身的价值，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简言之，文明交往论也是研究和解读古代北非历史的一把钥匙。

三 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氏族（家族）、部落、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问题

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氏族（家族）、部落、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是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氏族、部落和部族通常被视为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类型，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氏族和部落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其存续，氏族是组成部落的基本单位，在氏族内部又组成血缘家庭。氏族和部落观念根深蒂固，其成员对所属氏族和部落的忠贞是无止境、无条件的。^① 而部族已不再以血缘为纽带，它主要以地域为联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并有一套适合本部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将部落定义为“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其功能和属性是：具有一块领土和一个名称，具有独用的方言，对氏族选出来的首领和酋帅有授职和罢免之权，具有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祭祀，有一个由酋长会议组成的最高政府，在某种情况下有一个部落大首领。^② 美国

^① [美国] 菲利普·K.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页。

^② [美国]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页。

另一位人类学家约翰·霍尼格曼认为，部落是“具有共同的领土、共同世系的传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族称，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连接诸如村落、群居、区域或世系等较小集团的基础。”^①

北非的部落组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土著的柏柏尔人或是已被阿拉伯同化的柏柏尔人组成的部落；二是伴随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对外扩张大规模进入和分散到北非各地区的阿拉伯部落。阿拉伯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认为，部落中的每一个小区域、每一个小部分，都属于同一个大的部落，它们又可分为许多小的族群和小的家族，它比大的宗谱血统团结得更紧密、更加牢固。部落的领导权就属于他们中间的核心族群，掌握领导权的族群必须具备优势和控制能力。^② 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局限，非洲的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是由不同的部落或部族发展而来，这些部落或部族历史悠久，谱系血缘关系密切，部落社会基础牢固，内部结构庞杂，社会政治影响极大。在非洲各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家族和部落因素始终是困扰其实现民族和国家认同、确立公民意识的难以消除的障碍。在一些国家，家族和部落甚至扮演着决定国家稳定、左右国家发展方向的关键角色。

以利比亚为例，利比亚国内有 140 多个部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30 多个。但在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则属于三大部落联盟：东部地区的萨阿迪部落联盟；中部地区的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联盟；^③ 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巴哈尔部落联盟。在历史上，利比亚的各家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积怨很深，矛盾重重，难以形成所谓国家层面的公共权力。因此，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祖先凝结而成的家族和部落，以及伊斯兰传统始终是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依据，致使利比亚在历史上有部落无国家，呈现出“碎片化”的政治地理特征。^④ 1969 年，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和“革命手段”，试图对利比亚的部落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以便打破部落藩篱，并以国家认同取代部落意识，强化国家的内聚力，但收效甚微。根据民调，及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利比亚民

① [法国] 莫·戈德利埃：《部落的概念》，沈静芳译，载《民族译丛》1984 年第 4 期，第 33 页。

② [突尼斯]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63 ~ 164 页。

③ 卡扎菲家族所属的卡扎法部落（Qadarha）和利比亚最大的部落瓦拉法部落（Warfalla）都属于该部落联盟。

④ 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117 页。

众对部落的认同仍高达 96%，城市人群中对部落的认同也有 90%。^①正是由于利比亚强大的部落势力，迫使卡扎菲在其统治利比亚近 30 年后不得不改弦易辙，转而重新回归传统，更加仰赖利比亚的三大部落势力来维系其统治，直到 2011 年政权垮台。时至今日，政权更迭近 10 年后的利比亚，依然被置于互不统属、一盘散沙式的部落割据态势，由此折射出部落因素对利比亚政局的根本性影响。

再以苏丹为例，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苏丹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诞生之地。早期的人类在苏丹经历了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族的发展过程。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苏丹古老的部落体制经久不衰，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亦即以氏族部落构成的原始公社形态，或是以主体部落与不同血缘部落组成的酋邦，乃至大、小王国交替出现。因此，氏族部落自古以来始终是苏丹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现今的苏丹仍有将近 600 个部落，使用不同的 2 000 多种语言。^②苏丹的部落有南北之分，北方主要为阿拉伯部落和非阿拉伯部落。两者的区别有二：一是苏丹阿拉伯人必须以阿拉伯语为母语；二是其祖先必须来自阿拉伯半岛，或是具有阿拉伯的谱系关系，或是其部落已完全阿拉伯化。然而，所谓苏丹纯正的阿拉伯部落之说很可能只是一个历史虚构，它实际上反映了苏丹阿拉伯人对阿拉伯半岛谱系关联的强烈认同。这与黎巴嫩出生的美籍历史学家希提的看法如出一辙：血缘关系，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总是维系部族组织的重要因素。^③苏丹北方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阿拉伯部落是贾阿林部落，此外还有丹拿格拉和朱海纳部落。苏丹南方主要为黑人部落，丁卡人构成了原苏丹的第二大部落，占原苏丹全部人口的 10%^④，约 310 万^⑤。苏丹北南双方庞杂的部落结构，使它在独立后构建民族国家进程中屡遭挫折，内战绵延不绝，以至于在 2011 年苏丹北南双方分裂，南苏丹宣告独立。显然，苏丹的南北分裂同种族或部落冲突相关，但这

① Am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Routledge, 2001, p. 121.

② Mawut Achieque Mach Guarak, *Integ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Sudan: An African Renaissance*, Bloomington: Authorhouse, 2011, p. 12.

③ [美国] 菲利普·K. 希提：前引书，第 28 页。

④ John Obert Voll and Sarah Potts Voll, *The Suda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a Multicultural State*, Unite State: Westview Press, 1985, p. 13.

⑤ Mawut Achieque Mach Guarak, *Integ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Sudan: An African Renaissance*, Bloomington: Authorhouse, 2011, p. 635.

只是一种表象，透过表象可以发现其中更深层的原因：一是北南双方明显存在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当彼此的穆斯林和基督徒身份在强制性的伊斯兰化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时，必然会导致矛盾的激化；二是苏丹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致使不同部落和部族之间经常因争夺牧场、水源和其他生活物资而兵戎相见；三是苏丹北南双方在政治权利方面不平等。苏丹长期存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歧视，阿拉伯文明被人为地凌驾于黑人文明之上，北方隶属贾阿林部落的阿拉伯河岸部落始终主导和控制着苏丹的政治和经济政策，^①并通过强制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把持国家大权，致使其他部落处于边缘化状态。家族和部落因素在苏丹民族国家构建中表现出了另一种特点。简言之，苏丹的家族和部落不过是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凸显各种矛盾冲突的一个载体。

家族和部落因素在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影响无疑是多元而复杂的。其他国家诸如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的家族和部落组织，也都有自身发展演变的路径和规律，它们对各自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自然也是不同的。探究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家族和部落问题必须把握两个维度：一是应该厘清非洲阿拉伯诸国主要家族和部落的基本情况，这包括家族和部落的区域分布、成员的构成、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内生矛盾冲突的调节、对外交往原则、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维护等等；二是在全面认识非洲阿拉伯各国的家族和部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需要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来阐释和解读非洲阿拉伯各国的家族和部落长期存续的原因。总体来说，非洲阿拉伯国家在获得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后，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化发展，并对部落社会进行了相应改造，各国的部落呈现一定的萎缩之势。但家族和部落依然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国家稳定的关键因素。而关于部落意识向国家认同的转化，也是一个双向度的问题。非洲阿拉伯国家滞后的社会发展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各国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的转换将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部落意识的弱化有赖于部落民众能够充分感受到他们在没有或失去部落庇护的情况下，同样能够享有更多的权益和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

^① 阿拉伯河岸部落是指那些生活在尼罗河谷和青白尼罗河之间热带草原东、西部的部落，他们几乎都说阿拉伯语，均为穆斯林，并尽可能将自身谱系与阿拉伯半岛先知时代的圣裔家族联系在一起。See R. S. O' Fahey, "Islam and Ethnicity in Sudan",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Vol. 26, No. 3, 1996, p. 259.

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仰仗各国社会和经济发 展所能提供的雄厚财力和物质基础，同时还依靠各国政府能够有效实施各种 有利于协调部落与国家关系，促使部落民众生成国家认同的一系列相关手段 和政策。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考量和辨析是探究非洲阿拉伯国家家族和部落问 题的一种新的尝试。

四 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

在近现代历史上，非洲阿拉伯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曾长期饱尝西方列 强残酷的殖民掠夺和统治。法国率先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建立了以阿尔及 利亚为中心的殖民统治圈。1830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1 年，突尼斯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88年，法国占领吉布提全境，并于 1896年在吉布提建立“法属索马里”殖民政权^①；1912年，摩洛哥沦为法国 的“保护国”，同年科摩罗四岛也成为法国的殖民地；1920年，毛里塔尼亚 成为“法属西非洲”管辖的领地。英国紧步法国的后尘，它在奥拉比领导的 埃及反英起义失败后，于1882年占领埃及，并将其变为“保护国”；1899年， 在英国操纵下，苏丹成为英国和埃及的共管国；1887年，英国将索马里北部 地区作为它的“保护地”，并于1941年控制整个索马里。1912年，意大利在 意土战争后将利比亚变为它的殖民地；1925年，意大利在索马里南部建立 “意属索马里”；1943年，英国取代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南、北两地区；西班 牙在列强瓜分北非殖民地的浪潮中也分羹一杯。1912年，摩洛哥沦为法国的 “保护国”后，西班牙旋即与法国签订《马德里条约》，摩洛哥北部地带和南 部伊夫尼等地划归西班牙的“保护地”。至此，非洲阿拉伯诸国陆续被西方列 强纳入各自的殖民体系中。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 民统治时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 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

^① 在历史上，吉布提和索马里同属一个文化圈。法国于1850年前后入侵吉布提，1885年法国同 吉布提地区的酋长们签订条约，确认法国在吉布提的统治地位。1888年法国又同英国达成协定，两国 以吉布提和泽拉之间的中线划分势力范围，吉布提一侧为“法属索马里”，泽拉一侧为“英属索马 里”，1896年法国在吉布提正式建立“法属索马里”殖民政府。

物质基础。”^①但是，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长期统治只是完成了其破坏性的使命，即各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殖民者要完成的建设性使命则成了虚幻之梦。

以阿尔及利亚为例，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所著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揭露，自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法国的殖民统治“手段有时会改变，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并将其变为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这种财产易于最终转到法国殖民者手中。”^②恩格斯撰写的《阿尔及利亚》一文，也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进行了针针见血的深刻描述：“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③

利比亚被形象地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合国“制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也是域外大国之间相互博弈、各自谋求在利比亚权益的一种妥协的产物。美国驻利比亚首任大使亨利·赛拉诺·维拉德（Henry Serrano Villard）曾指出，利比亚的历史基本上是征服与占领交替更迭的历史。^④据统计，1912年利比亚被征服后，在意大利殖民统治的30年间，大约有11万利比亚人被关押在集中营，4万人死于疾病、虐待或饥谨。最新的利比亚解密档案显示，意大利殖民者处死的囚禁者多达7万人；^⑤而本土人口则从1907年的140万降至1933年的82.5万人。^⑥

西方列强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非洲阿拉伯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同时，被置于殖民体系中的非洲阿拉伯国家不得不在屈从或服务于各宗主国殖民权益的前提下，实施自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政策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4页。

④ 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1.

⑤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Oxford: One world, 2009, pp. 73 - 74.

⑥ Ibid., p. 81.

致使这些政策普遍带有明显的殖民依附色彩。例如，科摩罗的许多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源于殖民时代，一位科摩罗律师比喻：“科摩罗国家是从法国复制而来的，它是复印件。”^①又如，吉布提独立后，法国在此长期驻扎 4 000 人的军队，^②并宣称为吉布提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

此外，西方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实施的殖民手段和方式，也因对象国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那些战略和经济利益重大的国家，通常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对于那些小国或经济权益有限的国家，他们往往通过挑选代理人，诸如当地的封建主和有名望的部落酋长、首领等实行间接统治。非洲阿拉伯国家对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一直进行着顽强抗争，但各国谋求独立和解放的途径，则因国情不同和殖民者统治方式的差异而呈现反差。一般来说，在那些殖民统治最残酷的国家，民众浴血反抗的斗争就更加激烈。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阿尔及利亚人自 1954 年在奥雷斯山区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后，经过 7 年艰苦卓绝的反法解放战争，最终粉碎了法国强加于阿尔及利亚人长达 132 年之久的殖民枷锁，于 1962 年赢得独立。科摩罗、吉布提和毛里塔尼亚这些小国基于自身的局限，以及它们同前宗主国法国的无法割断的各种联系，因而选择了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走向独立。利比亚历来是大国逐鹿争雄之地，它的建国彰显了大国在联合国舞台上折冲樽俎、不甘舍弃已有权益的博弈。故此，西方列强在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史是非洲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殖民统治对各国历史进程所衍生的各种关键问题及影响，都需要依据可靠的史料做出尽可能符合客观事实的更深层次的再分析和全新的解读。

五 现代化运动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

现代化源于西欧，是伴随近代工业革命所聚集的强大内动力所兴起的。二战结束后，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非洲阿拉伯国家在战后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驱动下，陆续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外源性和后发型是非洲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基本特点。非洲阿拉伯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原动力、

^① Iain Walker, *Becoming the Other, Being Oneself: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p. 183.

^② André Loudouze, *Djibouti: Nation Carrefour*, Paris: Editions Karthala, 1982, p. 188.

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社会基础和价值取向等完全不同于西方，由此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最复杂的过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按经济形态来区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而每一种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①但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要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总体上都属于混合类型，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它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色，是将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一种中间发展形式，在本质上是一种边缘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②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堪称战后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一种主流。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战后西亚北非地区盛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密切相关。阿拉伯社会主义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所构成，是一种带有浓厚阿拉伯—伊斯兰特色的社会思潮。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主张，名目繁多，形式不一。其中包括：埃及的纳赛尔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以及索马里西亚德总统自封的“科学社会主义”等。^③阿拉伯社会主义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的教义精神，认为伊斯兰教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渊源；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和振兴民族，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纲领和手段；三是拒绝科学社会主义，明确反对无神论，强调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基础，尊重民族和宗教文化传统，主张阶级合作和私有制的永恒性。^④纳赛尔就曾表示，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性差异，并且具体表现在五方面。^⑤这便昭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

阿拉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选择的现代化发展

①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②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9页。

③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自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但从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宣称其“科学社会主义”是与伊斯兰教“和谐一致”的，“伊斯兰教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基础”。参见唐大盾等著：《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④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311页。

⑤ 1962年5月30日纳赛尔在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埃及]《金字塔报》1962年5月31日，转引自唐大盾等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模式，一方面是由于非洲阿拉伯国家深受殖民主义之害，导致其本能地排斥西方发展模式。亦如研究者所言，当资本主义与殖民国家和剥削特权联系在一起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在非洲无疑成为普遍的诉求。^①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实践，确实取得了一些不容否认的成效。一些数据也可说明这一点。例如，埃及的工业产值从1952年的3.14亿埃镑增加到1979年的61.6亿埃镑，增长了19倍多。同一时期，农业产值由3.87亿埃镑提高到36.6亿埃镑，增长了9.46倍。^②阿尔及利亚在1967~1978年国民经济保持年均7.2%的增长率，十多年间人均国民收入从375美元增至830美元。^③突尼斯经过十年的建设，基本形成自身的民族工业体系，国有企业从1960年的不足25家发展到1970年的185家，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1.8%上升到33.7%。^④

然而，由于内外和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局限，非洲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失败远大于成功，是一种不成功的现代化尝试。它们面临一系列难题：诸如政治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外的严重依赖性；生产结构的单一性与脆弱性；社会经济的二元性与对立性；工业分布的条块性与不均衡性；过度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失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这些问题使非洲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阿拉伯社会主义为主导的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无不经历了趋于衰势的变化。80年代末期，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有关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议题在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从反思的角度看，理性处理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仍是非洲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不能回避的课题。宗教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使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充满了“悖论”。由于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尚未真正出现比较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未能在人的解放和价值取向等问题上实现跨越性的突破，伊斯兰世界在近代的各种社会改革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改良范畴，其主轴大都

① E. A. Alport, "Socialism in Three Countries: The Record in the Maghrib",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3, No. 4, 1967, p. 692.

② 唐大盾等著：前引书，第116页。

③ Massoud Karshinas, Valentine M. Moghadam, *Social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Gender Dyna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42.

④ I. William Zartman ed., *Tunis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Boulder&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 111.

以捍卫伊斯兰教传统价值观和巩固当权者的统治为目标。它们触及的仅仅是应对外来挑战的表象问题，而回避对其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内省与更新，从而制约着各国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

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战后的非洲阿拉伯国家盛行 20 年之久，它是独立后的非洲阿拉伯各国选择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制度。因此，其核心仍是国家定位和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将有助于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相关理论。

六 早期的伊斯兰教与当代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潮

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① 早期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肇始于第二任哈里发时期穆斯林军队于公元 639 到 642 年对埃及的征服。非洲本土人最早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大多为社会的上层，其中又以统治者和成功的商人最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穷人和乡村居民的改宗要晚得多。故此，早期的伊斯兰教在非洲被称为“宫廷和商业宗教”，^② 这一宗教首先在政界及商界权势人物中传播开来。后来，埃及人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同时，新的伊斯兰政府容许的宗教自由也比拜占庭要多。科普特基督教徒直到 11 世纪依然占埃及人口的大多数，便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佐证。

在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北非实际上也是那些发现自己与中央伊斯兰国家日益强大的逊尼派正统观念不合的穆斯林的庇护所。^③ 伊斯兰教初期的两个重要少数派教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④都在北非找到了避难地。哈瓦利吉派落脚于北撒哈拉沙漠中的小绿洲，他们同土著柏柏尔人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526 页。

② [美国]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 雷诺兹著：前引书，第 109 页。

③ 同上书，第 95~96 页。

④ 哈瓦利吉派（Khawāridj）伊斯兰教早期派别之一。哈瓦利吉意为“出走者”，657 年隋芬之战期间，穆阿维叶在面临失败时提出“以《古兰经》裁判”的停战要求。当时阿里营垒内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阿里倾向和解，遂接受穆阿维叶的要求，引起主战派的极端不满，约有 12 000 人离开阿里的队伍出走，组成哈瓦利吉派。此外，该派认为哈里发应由穆斯林公选，当选者不应只限于古莱什人。同时主张在所有穆斯林中共同分配土地和战利品，故又称军事民主派。

系。什叶派在北非的势力和影响更大。公元 909 年，什叶派首领奥贝德拉在突尼斯以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的苗裔自居，被拥戴为哈里发，建立法蒂玛王朝，这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第一个王朝。国都为马赫迪亚^①。随后，法蒂玛王朝征服摩洛哥，进而占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969 年攻占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埃及，973 年迁都开罗，实施了长达 200 余年的统治，直到 1171 年被推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初期，在北非的一个共同现象是：无论是基督教的少数派阿里乌斯派和一性论派，还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都把北非作为大本营，或是作为庇护地，这一现象的历史蕴含令人深思。或许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北非阿拉伯诸国出现的各种伊斯兰复兴思潮或运动，都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就地缘政治来说，它不像西亚阿拉伯国家那样，处于中东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因而受外部影响相对较少。就对外交往来看，北非诸国毗邻欧洲，在历史上多为法、英等国的殖民地，与西方有密切联系，故此对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体验也比西亚阿拉伯国家更深刻。这些因素凝聚了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多元化色彩。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在埃及、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形成几个中心。一般来说，北非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调趋于温和与理性。这里并不否认在某些特定时空下出现的极端倾向。以埃及为例，由哈桑·班纳于 1928 年组建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是埃及最大的民间伊斯兰组织，20 世纪 70 年代虽然穆兄会分裂出一些激进组织，包括“赎罪与迁徙组织”和“圣战组织”等。但总体上看，埃及历届政府基本能够掌控来自宗教势力的挑战。纳赛尔时期，埃及政府与穆兄会的关系在合作、利用和打压中轮换。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基本放弃暴力手段，转而采取和平、合法和半合法的斗争策略。穆兄会中占主导的温和派强调，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伊斯兰化，以理性和现代的角度看待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政府的功能。^② 由此，政府与穆兄会之间形成了容忍、妥协、限制和反限制关系的动态性变化，从而维持着埃及社会的稳定。

苏丹的哈桑·图拉比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丹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政治思想

^① 法蒂玛王朝最初建都拉卡达，即今突尼斯的凯鲁万，后于 920 年迁都马赫迪亚，位于凯鲁万东南海岸。

^② R. H. Dekmejian, *Islam in Revolution: Fundamentalism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1.

家，有“非洲霍梅尼”之称。图拉比同1989年发动军事政变掌权的巴希尔合作，在苏丹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图拉比主张实行政教合一，全面实现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苏丹实施所谓的“伊斯兰试验”。图拉比认为，他的伊斯兰试验是“建立在人民价值观基础之上，由知识分子引导，动用宗教资源促进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新尝试。”^①他还认为，伊斯兰复兴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没有内部压制和外部干涉的形势下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发展。^②因而，一方面，他反对暴力，强调伊斯兰教的温和与宽容，认同与时俱进的宗教改革，倡导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地位等。这些都体现了图拉比伊斯兰试验的温和性。另一方面，图拉比的伊斯兰试验始终被限定在其合作者世俗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设定的轨道内，巴希尔决不允许图拉比的宗教权势凌驾于其权力之上。事实上，代表国家政权的巴希尔与代表伊斯兰势力的图拉比的政教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借重和彼此利用的关系。在苏丹这种多部族多宗教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教权显然无法与世俗政权相抗衡。

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另一个类型，体现了阿尔及利亚宗教政治化和政治暴力化的双重特点。1989年诞生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下简称“伊阵”）是阿尔及利亚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复兴组织，其主要领导人阿巴斯·迈达尼是一个拥有英国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另一个是清真寺的伊玛目阿里·贝尔哈吉。实际上，他们分别代表着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两大势力。尽管存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但这并未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有研究者将他们对外发出的不同声音形象地喻为“双头性领导”下的“多声部合唱”。^③两人迥然不同的风格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不满的阿尔及利亚人。^④伊阵主张维护穆斯林共同体的统一，捍卫伊斯兰历史和文化遗产。^⑤其最高目标是通过和平斗争的策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化。但是，军队作为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胜利者的象征，它

^① Hassan Al - Turabi, "U. S. House Foreign Affairs Africa Subcommittee Hearing on the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Africa", <http://www.Islamonline.net/iol-english/qadaya/qpolitic-14/qpolitic1.asp>, 2020-07-12.

^②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③ 蔡佳禾著：《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④ Robert Motimer, "Islam and Multiparty Politics",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1991.

^⑤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5, p. 252.

不允许伊斯兰势力改变国家的世俗发展方向。当伊阵通过市政和议会选举即将掌控国家政权时，军队毫不犹豫地予以干涉，终止了其迈向权力舞台的步伐。而伊阵内部和政府内部对事态的不同认知，最终酿成了一个分裂的政府与一个分裂的伊斯兰反对派之间对抗的危机。^① 据统计，在随后的 4 年多时间里，暴力冲突和派别残杀此消彼长，约有 6 万平民和军人死亡。^② 阿尔及利亚被打上了暴力政治的特有符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95 年 11 月泽鲁阿勒赢得阿尔及利亚历史上首次自由选举的胜利，由此证明了阿尔及利亚人最终抛弃了困扰国家政治的宗教和世俗极端主义。^③

从北非三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来看，尽管其目标和行动手段有相似之处，但三国互不统属，几乎不存在彼此的协调和支持。这种状态表明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分散性和多样性，因而外溢影响有限。同时，它也揭示了北非宗教复兴运动所聚集的能量和张力，无论是在同世俗政权合作还是在抗衡方面，都不足以占上风的总趋势，更无法改变世俗政权主导国家政治秩序和发展方向这一历史事实。

七 政治剧变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

北非是 2010 年底 2011 年初阿拉伯政治剧变的发源地，三个阿拉伯共和制政权先后垮台，从而诱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震荡。此次政治剧变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上的极度僵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错位”，以至于它们无法满足阿拉伯民众对民生、民主、民权的期盼。换言之，阿拉伯变局实际上也是阿拉伯民众谋求重新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抗争。

然而，旧政权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新制度的建立。早在政治剧变之初，巴林思想家贾比尔·安莎里在一篇文章中就写道：“一层厚厚的浪漫主义之膜，正裹绕阿拉伯国家当前的变革要求。这种情形，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过，我们曾经梦想过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但我们等来的却是专制，它带给我们的只有挫败和失望。”^④ 另一位阿拉伯政治家指出，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

^① William B. Quandt, *Between Ballots and Bullets: Algeria'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 58.

^② 蔡佳禾著：前引书，第 135 页。

^③ 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7, p. 120.

^④ 贾比尔·安莎里：《只有革命浪漫主义还不够》（阿拉伯文），载《生活报》2011 年 4 月 25 日。转引自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37 页。

者，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问题是：如何让变革从表面及于纵深，从形式过渡到实质？^① 这些担忧和发问似乎已预感到阿拉伯变局前景的迷惘。而后来阿拉伯变局的走向也印证了这一点：埃及经历了翻烧饼式的政权“轮回”，从穆巴拉克的垮台，到穆兄会的穆尔西在权力之巅的昙花一现，再到穆尔西被军人政权所取代，民主政治似乎离埃及依然遥远；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陷入四分五裂的武装割据状态，各派系之间的混战绵延不绝，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建渺无音讯；唯有突尼斯的局势让人看到了一缕“阿拉伯世界微弱的曙光”。2014年12月，突尼斯诞生首位民选总统，国内局势趋于相对稳定，但突尼斯的腐败之风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根据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2010年突尼斯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中位列178个国家的第59位，2016年则在176个国家中名列第75位。^② 因此，突尼斯的社会改造和政治变革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因政治剧变而发生明显变化，一些地区和国家出现权力“真空”。为抢占地盘和扩张势力，不同派系之间的恶斗持续升温。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和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均是恐怖主义的渊藪。利比亚境内的恐怖活动日甚一日，它们所释放的破坏力对近邻突尼斯的稳定构成威胁；索马里青年党作为东非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组织，它在阿拉伯政治剧变后进一步扩大活动领域，频繁制造一系列暗杀和暴恐事件，破坏索马里和平进程与民权社会。同时，索马里猖獗的海盗劫持活动，^③ 也在严重干扰着国际水道的航行安全和各国间的经贸交往。

阿拉伯政治剧变距今已有十年，反观非洲阿拉伯诸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现状，多数国家仍在过去的老路上徘徊不前，尚未在新的探索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没有找到能够理性化解长期困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族群割裂问题的有效策略。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如此之艰难，

^① 阿多尼斯：《布瓦吉吉的骨灰》（阿拉伯文），载《生活报》2011年4月28日。转引自马晓霖主编：前引书，第438页。

^②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10/25/tunisia-s-corruption-contagion-transition-at-risk-pub-73522>, 2020-07-12.

^③ 据国际海事署报告，在索马里海域发生的海盗袭击次数为，2006年18起，2007年48起，2008年111起，2009年215起，2010年219起，2011年236起。See Elwaleed Ahmed Talh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omalia Piracy during the Period (1991-2012)*,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3, p. 14, http://www.pp.u-tokyo.ac.jp/courses/2013/documents/5140143_9a_, 2014-10-02.

可从两个层面来解析：一是缘于自身的局限。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经受过现代大工业血与火的洗礼，迄今还不能形成一个能够体现或代表先进生产力，并能领导和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社会阶层。这表明非洲阿拉伯国家仍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二是基于非洲阿拉伯国家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宗教被人为地承载了过多的非宗教因素，因而需要不断理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等方面的关系，并且必须防止伊斯兰教义被随意曲解和“工具化”，从而挑起宗教狂潮，使国家的正常发展迷失方向。“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而且在根本上还与价值观念有关。因此，要建立相对性、多元化的民主理性，就必须撼动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①由此可见，实现与时俱进的宗教变革和激活人的创造力，将是非洲阿拉伯国家长期和不可懈怠的使命。

八 结语

如前所述，非洲阿拉伯国家多达十个，各国国情独特而复杂，呈现纷繁和多元的色彩。但非洲阿拉伯国家同样存在共性，在历史演进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相同的。按照传统观点，对于国别通史的研究，通常的聚焦点大多是诸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等这些显性要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演化。毋庸置疑，这些要素是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但笔者并不仅仅拘泥于这些显性要素，而是审慎地选择更贴近客观社会现实，且能折射事物本质的七大问题来解析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发展。这实际上是力图从一个不同的新视角，来探讨非洲阿拉伯国家综合性通史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尝试完全取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固有的独特国情，也是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进程中必须直面的重大议题。它有利于突破惯性思维的窠臼或定式，从更深层次认知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变迁。上述七大问题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专题研究案例，又是一个彼此关联、互为作用、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依据多层面的视阈和大量客观史实，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阿拉伯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独特样貌及嬗变，并从根本上影响着非洲阿拉伯国

^① 本·阿舒尔：《民主派和神学派的政治活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报》2011年3月14日。转引自马晓霖主编：前引书，第438页。

家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构建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一个大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路径，以便在纵横维度的比较研究中揭示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Wang Tiezheng

Abstract: The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involves many issues that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seven major issues, namely,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the change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Ancient North African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clans, tribes and tribal ethnic groups on the nation – state identity of Arab countries in Africa; the colonization of Western powers in African Arab countries;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Arab socialism; Islam in the early times and the Islamic Revival Movement in African Arab countries; political upheaval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ab countries in North Africa. These issues, interrelated with and propelled by each other, fundamentally affect the trajectory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and construct an overal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and by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ies, they reveal the basic laws and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n Arab countries; historical theories; ancient north African civilizations; nation – state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Arab socialism; islamic tide of thoughts; political turbulence in north Africa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